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罗进德 主编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变译理论

黄忠廉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变译理论

黄忠廉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译理论/黄忠廉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1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0942-3

I. 变... II. 黄... III. 翻译理论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367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萨克达

封面设计/长 景

印 刷/香港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0.12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1-5 000

ISBN 7-5001-0942-3/H·289 定价: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 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目前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中,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

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目前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如果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介绍中国和外部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外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欣喜地看到,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迫切需要、大有用处的知识技能,翻译学作为一门内涵深广的人文学科,在最近二十年的新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学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评论翻译和从事翻译职业的实践,已经成为与对外开放同步前行的社会文化热点之一,持续升温。翻译教学和译学理论研究,其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水平之高、成果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引起国际翻译学术界的瞩目。中国作者的名字和作品在国际权威译学刊物上频频出现,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的成就。翻译教学已经从语法为纲的语法复制型翻译模式中解放出来,已经分清了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这两个本不应混淆却曾长期混淆的基本概念,大学翻译课不再是外语教学的手段,而是在双语知识基础上培养口笔翻译技能的高级课程。翻译理论研究继文艺学、语言学之后,又有了美学、语篇分析、社会符号学、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等从多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或理论工具,为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开放的,跨学科的人文科学的地位奠定基础。有关翻译的知识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不应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应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翻

译教学和理论研究领域这些可喜的变化,无疑对造就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提高我国数以十万计的翻译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理论与实践互动,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有两个良好趋势值得注意。一是随着新一代翻译工作者和翻译教师、翻译研究家的迅速成长和翻译学科的壮大(以翻译学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点已有近百个,博士点约有十个),以及众多翻译学术刊物的出现,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专著的出版,特别是由于译学研究成果的可信和有用,“翻译无理论”和“翻译理论无用”的声音,除了极个别场合外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这当然是个积极的变化。二是译学著述不再是文学翻译家和大学翻译教师的专利,各行各业从事翻译工作的有心人,他们挟着丰厚的实践经验,迈步跨入这个领域,著书立说,带来一阵阵清新气息。这方面以科技翻译界贡献最为突出,其他如外交、贸易、金融、工商企业、编辑出版、对外宣传等各界,也都有作者涌现出来。翻译实务的经验以此得到总结,得以条理化、系统化,为后来人指点门径,同时也为我们的译学建设作了贡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为用,有血有肉、骨肉匀停,这一趋势无疑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的。

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正是在上述喜人形势之下应运而生,编辑出版的。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成立二十多年来已经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奠定了公司在译学书籍出版方面的领先地位。尽心竭力继续为翻译界广大专家、学者、教

师、从业人员、学生和人数众多的翻译爱好者提供高质量的专业读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在已有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有几点想法:一、加强自主策划,提高原创性,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二、加强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仅要反映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新趋势、新成果,更要关注科技、经济、法律、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实务;三、笔译与口译兼顾,英译中与中译英兼顾,着重于中英互译和中译英;四、有选择地引进境外著作,港台海外华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不乏佳作,立足中华语言文化,有其独特魅力,是我们的首选。

这些想法能不能实现,能不能把我们贡献精品的愿望变成现实,全靠翻译界广大学者专家、学校师生以及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合作,没有这种支持与合作,我们的想法再好也只是空话而已。我们所期待的支持与合作,既包括惠赐书稿、推荐选题、介绍作者,也包括对我们已出的书发表评论,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将鼓励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是我们无任欢迎的。

丛书主编 罗进德 谨识

继承与创新

——《变译理论》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翻译理论研究十分活跃。翻译理论肯定仍是学术界一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热门话题。而黄忠廉教授在世纪之交完成的《变译理论》是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变译理论研究》结下的硕果,是一项颇具创新意识的研究成果,它填补了我国和国际译论研究的空白,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和新时期的翻译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继承与开拓方面,也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立足实践,勇于创新

近年来,黄忠廉教授一直勤于著述,即使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也没停止变译理论研究。1998—2000年他先后发表了十余篇(部)翻译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包括研究严复翻译思想“另一面”的文章四篇,还有《翻译本质论》和《翻译变体研究》专著两部。他的著述并非人云亦云,总是在发掘“另一面”的新意。而现在出版的《变译理论》,更是一部凝聚他多年翻译思想的创新之作。

《变译理论》专著走的是一条独辟蹊径的研究之路,它深深地植根于本国丰富的变译实践土壤,包括他自己的和严复的,并参照世界变译实践,与现行翻译理论形成对照之时,又凸显出自己的风姿。因为,愈是本土的,也愈是世界的。食洋不化,只会拿西洋理论裁剪中国的翻译实践,世界未必承认你,认你为一家。惟有发掘身边的东西,同时将人家的理论化为本土的东西,重建一套分析并指

导本土实践的理论框架,才能对外来的因袭之论作出富有挑战性的回应,才会被人认可。此类的学术成果才真正具有国际性、开放性,成为世界多元学术文苑中的一枝奇葩。

正是立足现实,黄忠廉才写成了前期成果《翻译变体研究》,正是勇于创新,他才创立了“变译理论”。

第二,理据充足,论证精辟

读完全书,我们感到整个论证过程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变译理论》的“上篇·变译理论立说”例举了大量的变译事实,确立了一对新的翻译范畴:全译与变译,明确地提出了变译理论。特别是第三章,充分地论证了变译理论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因为,变译理论是千百年来国内外翻译实践活动的很好总结。只要我们留意考察,全球文化交流中的变译现象早已随处可见,这就是“变译理论”研究的事实依据。

在“中篇·变译基本理论”中,作者论述了变译的本质,界定了变译的核心概念,从而使人认识到变译的本质和变译理论的基石。“所谓变译,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作者在定义中强调“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是有丰富内涵的,由变译的根本性特征“变通”派生出七种变通手段,即“增、减、编、述、缩、并、改”,由变通手段又组成了十一种变译方法,即“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释、译写和参译”。作者确切地论证了变译这一核心概念和十八个基本概念的逻辑关系,构成了整个变译理论体系,如变译的实质、系统,变译的手段,变译的方法、单位、章法、机制、过程、范围、价值。这一部分层层推进,论证过程逐步展开,有章有法。

如果说“中篇”雄辩地论述了变译的基本理论,那么“下篇·变译主客体论”论述了变译系统的另两个要素:主体和客体。“因读者而变,由译者来变,对原作施变”三句话精辟地反映了读者、译者和

原作与变译的关系。

整个论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深刻的理论性、很强的实践性。

第三,论述辩证,意义深刻

翻开《变译理论》,看到大量的典型实例和简明分析,我们在为作者生动的文笔欢欣之余,也从这些丰富的思想和有趣的实例中得到启迪。试问,我们平时从事文学、社科、科技等领域的翻译时,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方法和态度呢?作者在指责时弊、指出一些不严肃、不严密、不严谨的胡译乱译时,特别提倡正确的变译。他指出全译与变译二者并存,相辅而行,需全译时则全译,需变译时则变译。变译之中宜摘则摘,宜改则改,只要变译能多(信息比重大)、快(传播速度快)、好(信息质量高)、省(省时省篇幅)、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地吸收国外信息,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这种灵活的思路和辩证的思维,在市场经济发达和国际交流日增的今天,无疑很有现实意义。

当然,变译理论是中国人开发出来的,但并不能说仅适于中国的需要,仅仅是“中国特色的”,因为,变译也是世界各国海量信息交流的实际需要,变译理论也适应全球翻译事业的需要。记得1998年8月笔者和中国同事在比利时召开的FIT第15届世界翻译大会上联名用英文发表了“展望21世纪的中国科技翻译”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1997年11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上,科技翻译理论家黄忠廉……等人提出的‘变体翻译’,简称变译……这种变译观念,早在100年前中国学者严复曾提出过,并进行了翻译实践,由于种种原因,未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和广泛的效仿。但是,由于现实的需要,对科技信息的这种‘变译’观念,不仅会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且会为更多的人所推广并使之适应飞跃发展的社会需求”。(《中国科技翻译》,1999年第4期)尽管当时的论述还不很全面,不很完整,但在会上仍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会后,

还有中外同行朋友来同我们讨论。现在回顾起来,更觉得黄忠廉教授提出的变译理论,对各国变译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综上所述,《变译理论》应受到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虽然有的篇章尚须进一步深化。如“变译读者论”一章,就很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它是变译理论提出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这并不影响《变译理论》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不动摇其独树一帜的理论地位。因此,译界同仁有理由、有信心期待变译之花开得更艳。谨此为之作序。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李亚舒
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于中国科学院

变译论及其启示

变译论,乍一闻之或见之,会使多数人,包括译界同仁,无不感到耳目一新。变译是什么?何人首先提出的?此论的提出会给人们一些什么启示?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首先想到的,也无疑会出现在许多读者或听众的脑际。本文的主旨,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先谈点变译论,再谈提出此论的第一人,最后谈谈本人的几点感受,也就是获得的一些启示吧。

变译论是什么?它是变译理论的另一说法。什么是变译理论?《变译理论》第三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变译理论是从变译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映变译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原理和思想体系,它以变译为其研究对象,研究变译过程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寻求总的适于一切变译方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是关于变译的本质、特性、必然联系或操作规律的理性认识和知识体系……”。什么是变译呢?《变译理论》第五章第三节中的定义是“所谓变译,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这些翻译活动,根据同书的归纳,指的是译界不少人都熟悉的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这么十一种。

即将付梓的《变译理论》书稿,注重古今中外变译事实的发掘和理论方法的探求,并能在研究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此书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摆脱了近二十年来中国译论对国外译论的依赖。作者善于从我国译界实际出发,发挥抽象理论思维,从中提取基于翻译实践的变译理论,此可谓是华夏译论研究的一种突破。变

译在译界是一个新颖的提法,是一种前人未曾提过的新的翻译理论,是作者以严复译论研究为起点,基于国内外翻译实际,自己总结出来的,对于这一具有原创性的崭新的翻译理论,作者在书稿中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整体看,“变译理论立说”部分论述透彻,读之使人觉得作者言了前人未言之说,且令人感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变译基本理论”部分论述了变译本质一种,变译要素三个,变通手段七种,变译方法或形式十一种及其相互作用的单位、机制和过程等,显得层次分明和富有逻辑性。以上述内容为基础,再论及变译的主体(译者和读者)和客体(原作),这同样是传统译论所不大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通读书稿之后,我深感变译理论水到渠成,颇为完整。可以说,《变译理论》这一成果是一项立足中土,为华夏服务,开发我国译论资源同时放眼域外、联系实际的研究,这在世界译论研究中无疑具有独立存在的地位,是对世界译坛的显著贡献。

可喜可贺的是,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人,竟是初逾而立之年的年轻学者黄忠廉。我与黄忠廉相识,至今虽然还不到十年,但他的著作、他的言谈、他的人品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印象用“后生可畏”这一习语概括,我觉得是很恰当的。因此,我在自己主编,1999年夏由湖北教育出版社首版的《翻译名家研究》一书中欣然收进了他的大作“戈宝权”一文,并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关于本书作者……有的已成为译坛新秀,多次参加全国性重要翻译学术会议;有的可谓才华横溢,视野广阔,成果迭出,在全国翻译界已崭露头角。”这里所指的,无疑包括黄忠廉。另外还明确写道:“俄汉翻译研究学者,虽年青但其著译成果已非常丰硕的黄忠廉”,我想这些话绝不以为过,毫无溢美之词,完全符合实际。现照录200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他的专著《翻译变体研究》中关于他的简介,读者一看定会一目了然:“黄忠廉,1965年生。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俄语系,1990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

留学白俄罗斯国立语言大学。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翻译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译协科技翻译委员会委员,1998年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跨世纪学术骨干。专著或合著有《翻译本质论》、《翻译变体研究》、《中国科学翻译史》等七部;出版《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随笔集》(合译)等译著三部;发表论文近七十篇,其中在十六家核心期刊和国家级期刊发表以翻译学为主要方向的学术论文三十八篇;主持国家、教育部、湖北省、学校项目各一项。”具体说来,这些项目,除华中师范大学1999年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翻译本质论》一书之外,指的是华中师范大学“九五”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变体研究》,国家教育部21世纪教材改革项目《俄汉翻译开发教程》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变译理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教授李亚舒在《翻译本质论》一书的序中说:“三个项目分别从变译的操作方法、在译人才培养中的运用和理论立说三个层面上切入,这种系统的科研方法和思维方式在青年人身上显得弥足珍贵。”李先生所说的这三本书(或书稿),无论已经出版的还是即将出版的,我都认真读过,我认为李先生的评论是中肯的。仔细研读李先生写的序文之后,我可以说,最早识出黄忠廉这四千里马的伯乐,非李先生莫属,是李先生最先指出“他创新地提出了‘变译理论’”和翻译本质论。读李先生的精辟评论,读者定会对翻译的本质和变译论的形成过程、内涵和意义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翻译是在译作与原作间求似的过程’,阐述了翻译的内在规律不是译作与原作间的‘求忠、求信、求等’,在作者看来,是求‘似’。‘似’可分为九个层次,其中力求保全的翻译是‘全译’,如大多数的文学翻译,而对原作有所变动的翻译是‘变译’(‘变译论’也是作者首次提出的,并在1997年北京国际翻译研讨会上热烈讨论过),如部分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科学技术翻译。这是对翻译的内在规律的客观揭示,是对一切翻译活动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同时,翻译的内在规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翻译的哲学方法,即近

十年来,在多次翻译研讨会上,除了要研究同仁们提出来的翻译‘应该怎样’外,还应研究翻译是‘什么样’等一系列问题。另外,宽式翻译观中‘满足读者特定要求’这一特殊规定性还为另一类翻译现象——非全译(即变译)——提供了理论解释,使译界对占人类翻译实践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变译活动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能充分地利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创新和发展服务。”

一位年轻的学者,竟敢在名家如林的译界,向古今中外众多的权威及其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标新立异(此处是褒义),这需要何等的胆量?面对译界的这位新人及其新论,我深有感触。想起我往日主编出版的翻译教程,发行十年,读者数以万计,但和全国其他许多翻译教程一样,都未涉及变译的内容,应该说,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其译才决不是全面的。我和黄忠廉在此认识上的差距曾长时间令我思考。深思至今的结果,至少给了我如下两点启示。

第一,为什么只是在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的近几年而不是更早,才会有人提出这一崭新的变译论,并且会得到支持和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这无疑应该归功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和社会环境。是改革开放,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日益深入人心。是改革开放,才使我国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民主和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空气日浓。是改革开放,才有了政府科教兴国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钻研学术的积极性。总之,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学术的空前繁荣有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这是科研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外因或外部条件。

第二,处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古今中外的人们进行变译实践,至今已不下千年,为什么偏偏只有黄忠廉才首先提出变译论呢?就像在中国学术史上,国人说了不知多少年的话,并且作了几千年的文,为什么只有马建忠直到1898年才写出中国第一部有系

统的古话文的文法书《马氏文通》呢？或者说，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不知多少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为什么只有陈望道直到1932年才写出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修辞学发凡》呢？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我觉得，除了一些偶然性和外部条件之外，最根本的是作者个人的独特素质所决定的。具体地说，就是他们具有不同于别人的个人的德、识、才、学方面的条件。

关于德，根据我与黄忠廉接触的印象知道，他热爱真理，热爱学术，有志于学术事业，有为社会和翻译事业而不断进取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或自觉性，有热爱中华民族、决心使华夏译论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高尚情愫。在追求物质利益和学术上有所建树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几年前他离开江汉石油学院调进华中师大一事便是明证之一。这种精神，在当前大有物欲横流之势、大批人对物质实惠趋之若鹜的社会环境下，显得难能可贵。为了学术上的不断进步，他一贯谦虚好学，刻苦勤奋，自强不息。

关于识，我认为黄忠廉有明显过人之处：他对于学术研究，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而唯真理是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尊重权威又不迷信权威，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他在学术上能够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重要原因。任何人，欲在科研上有所前进，创新的头脑，也就是识的集中体现，至关重要。人们常说“胆识”一词，就是说，言行上的勇气是离不开见识的。黄忠廉比较喜欢的一句名言是歌德曾经说过的“凡是值得思考的事物，没有不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正是此类的名言，给了他很大的启迪和勇气，从这个例子，我们足可见其创新头脑的端倪。古今中外科学上的任何进步和科学巨人都同样离不开创新或富有主见的头脑。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

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步和自然科学同样,都离不开创新的头脑。如:法国大文学家福楼拜曾对莫泊桑说:“任何事物里,都有未被发现的东西,因为人们观看事物时,只习惯于回忆前人对它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星半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回顾严复以来中国译坛百年来的情况,大批的人,包括某些才智过人的大师级人物,的确都只习惯于回忆前人的想法,对全译的标准讨论了近百年,仍未有实质性进展,仍然是“言必信达雅”。正是黄忠廉长时间开动机器,大用富有见识的头脑,才敢于有理有据地对严复和众多名家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挑战。

关于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才能和才干,常常表现为办事的能力,在社会上与人交往的能力,把自己的思想、知识恰如其分表达出来的能力。简言之,就是办事成功的能力。要把事情办成,一个人应该有聪明的头脑和端正的品德。在社会实践中,前者可以外化为善解人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人所欲,勿施于人”;后者可以外化为与人交往,不卑不亢,做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广结友谊。上述种种能力和素质,我认为,黄忠廉都具备了。除此之外,黄忠廉还从事过几年科技翻译实践,大量接触变译,因此他的变译能力,在高校外语专业,实在是鲜有堪比。关于他恰如其分表达自己思想和知识的能力,常常表现为娴于词令的口才和出色的写作水平的文才。前者使他能在种种学术会议上及时表明自己的学术思想,使之广为人知;后者使他的文章与专著及时得到期刊的采用和出版社的接纳。我想,这就是他成果迭出,已为译界所瞩目的原因之一吧。

关于学,可以说是学术成果的基础。人们常把真才和实学相提并论或用在一起,看来,才与学是紧密相联的。虽然才学联系紧密,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才之所指,上段已述。学之所指,主要是一个